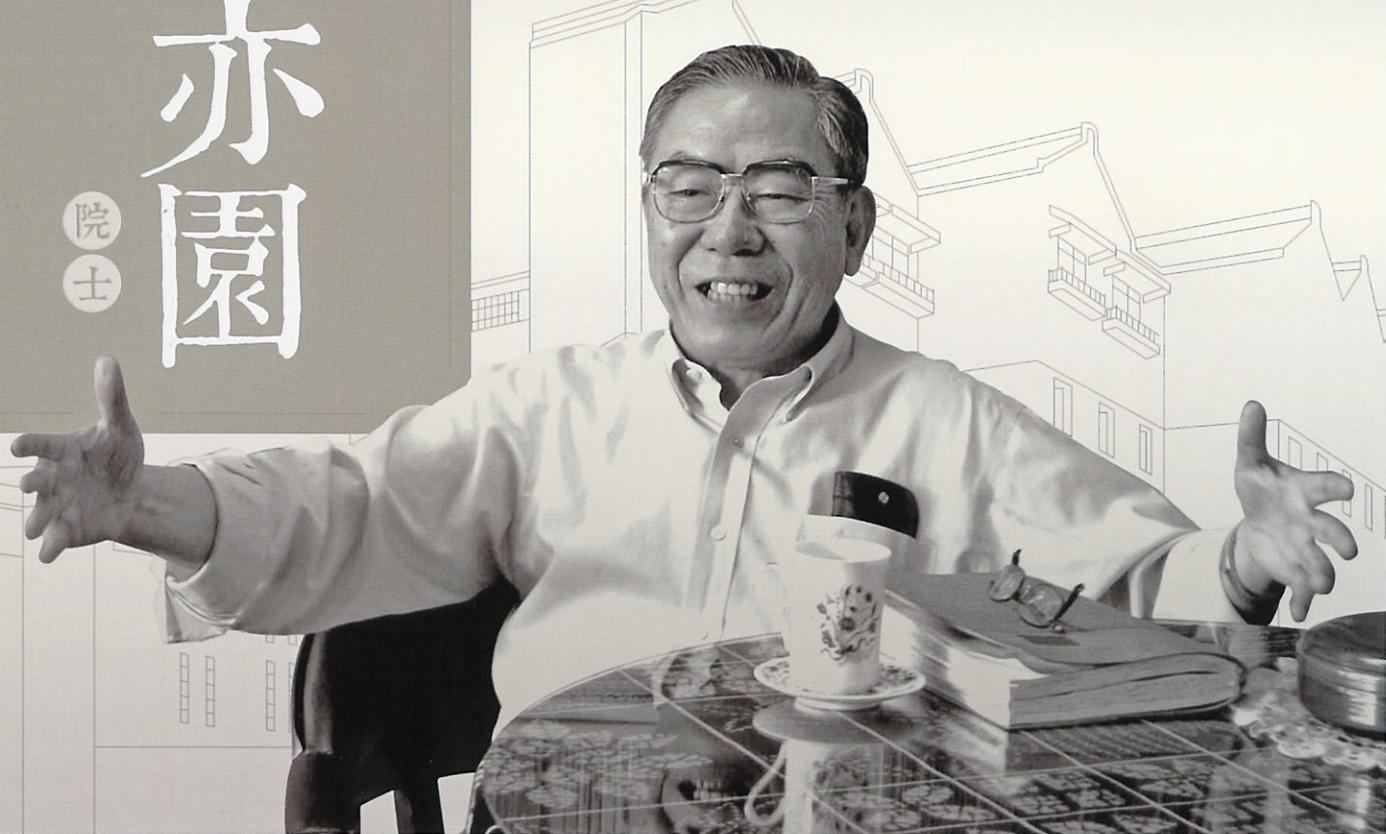


懷念
李亦園

院士



牌擦亮。我想這
一方式。

李亦園先生與臺灣民族學人類學學會的正名

黃智慧

回想起來，我們這一班何其幸運！在懵懵懂懂中進入臺大考古人類學系就讀，一班約莫 30 人的小系，學號單數結尾的同學被指定為李亦園先生的導生；此後 4 年下來，甚至更久，我們幸運地得到李先生特別的指導與愛護。除了每週固定時間留給學生之外，到學年度結尾時，他會慷慨地招待所有導生到餐廳聚餐，親切詢問我們的學習狀況。後來幾年改到他南港的家裡聚餐，一方面享受師母所燒的一手好菜，也和李先生天南地北談論各類議題。無形中我們學習到人類學者對世事的觀察角度，以及戰後初期李先生在學生時代對系上前輩學者孺慕之情與軼聞趣事等等，回想起來，能夠親炙大師風範，對於日後學者的養成與對母系向心力的形成影響至深。當時並不知道，我們竟成為李先生在臺大母系任教時期最後一班導生。

從個人角度而言，我特別感念修習李先生所開授名講「原始宗教」課程，深受啟蒙。作為他所關照的導生之一，不論是出國留學，歸國後就職，以至於人生婚姻大事的重要關頭，都會先想到要跟他報告，也總是得到他的指導與支持。對於一個這麼小的學系來說，要開創在臺灣學界的立足之地並不容易。對內，李先生毫不吝惜於奉獻時間愛護學生；對外，李先生積極地在報章雜誌上或各界演講，將人類學推廣出去。這就是他作為學界一代導師的魅力之處，他所關照的人、事、物幾乎無處不以臺灣人類學的發展與前途為念。

這樣的使命感在他晚年，我所經歷見證的一件人類學界「正名」的決定性大事上也很清楚反映出來。

自從 1987 年解嚴之後，許多學者的同業團體

都逐漸感受「正名」的壓力。當時內政部規定凡是全國性組織必須冠以中國之名，不能用臺灣為名。解嚴後為了突破這種虛構的框架，新興成立的學術組織例如：1994年成立的「臺灣政治學會」，採取有別於既有「中國政治學會」（1932年成立於南京，1953年在臺灣恢復）的方法，讓二者分立。於1998年新成立的「臺灣宗教學會」，則使用臺灣為名，沒有問題。然而不是每個學科都可以這樣做，尤其是歷史悠久的學會組織，要從原本冠以「中國」為地區名掙脫改為「臺灣」，所遭受阻力超乎預期。

例如：「中國比較法學會」（成立於1970年），1995年大會通過改為「臺灣法學會」卻遭遇困難，甚至須展開行政救濟程序，聲請大法官釋憲等，經過一番波折，1999年才獲得內政部同意辦理改名。

縱然如此，其他社會科學界的組織仍然紛紛成功「正名」。例如：「中國社會學社」原本是1930年在中國成立的學會組織，當離開中國來到

臺灣後，旋於1951年於臺灣復社，在困難的時代裡，延續了學術生命。這樣歷史悠久的學會，也在1995年就通過了改名為「臺灣社會學社」（2000年改為臺灣社會學會）。

又如：「中國心理學會」在臺灣創立於1961年，數十年後也在2003年成功改為「臺灣心理學會」。這個時候，眼看學科距離相近，甚至於和社會學、心理學者們同處於中研院民族所建築物內的民族學界，卻仍自稱為「中國民族學會」，當然備感壓力。

到了2005年，「中國民族學會」第22屆理事會上，臧振華理事長面臨必須處理棘手議題的時刻。會上青壯輩學者輪番發言，提出應該回歸到以臺灣為本位的理由。只有一個反對的聲音來自石磊先生，他無法捨棄對於這樣一個歷史悠久的團體名稱的感情。

1934年在中國南京創立的「中國民族學會」是中國第一代民族學／人類學者所組成社群組織，這

時代
也在
00年

1961
理學
和社
內的
然備

理事
的時
刻以
五磊
豐名
是
這

些學者如李濟之、芮逸夫、石璋如等雖然在國共戰爭後來到臺灣，1954年旋即在臺灣復會，延續了學術命脈，而他們仍以全中國為視野，致力研究，貢獻學界。若是更名，將背離了當年創會學者的精神，而且陷入了臺灣政治紛擾，憂心被臺獨意識所操弄易遭致外界誤解……，說到激動處，石先生甚至說若是改名，他將要離開本會。

此時，氣氛鬧僵了，謙沖溫和的臧理事長趕忙打圓場，可是這個議題再擱置下去，也不是辦法。只見坐在一旁，原本保持沈默的李亦園先生（監事），難得地開口發言。他說，如果是政治立場，由他本人的出身（中國泉州）與向來對中國的情感來發言，沒有人會懷疑他的政治傾向，不必擔心被外界誤解具有臺獨意識。他認為這件事要用務實的態度來看待。世界人類學民族學大會（ICAES）在2003年第15屆會議（義大利佛羅倫斯）決定了下一屆2008年，就要在中國雲南舉行。而新中國之後產生的一批新的民族學者，已經在1980年於貴

陽成立了同名的「中國民族學研究會」（1984年改為「中國民族學會」）。如果臺灣這邊不改名，到時候在中國雲南舉行，將會出現2個組織同名的雙胞案，主辦國也困擾，臺灣學者能否參加，更是未知數。

在李先生語重心長發言之後，理事會順利突破了心理障礙，終於在2006年第23屆大會上更名成功，也讓人類學並列，名稱改為「臺灣人類學民族學學會」。在臺灣社會科學界，算是最晚更名的組織之一，這其中，李亦園先生的發言與態度，居功厥偉。

我自己在學會擔任二屆理事任內，正好見證了「中國民族學會」最後一屆理事會與學會更名後的銜接過程，也學習到李亦園先生的真知灼見，日後學會名正言順，會務蓬勃發展。讓學術歸學術，政治歸政治，也是李亦園先生留給臺灣人類學界的一份珍貴資產。